

向未來課稅？機器人稅

陳國樑

政大財政系教授兼系主任／政大財稅研究中心主任

13 June '26

科幻教父艾薩克·艾西莫夫（Isaac Asimov）在一九五三年的經典小說《鋼穴》中，描繪了一個令人窒息的未來：人類擁擠在巨大而封閉的穹頂城市裡，社會因劇烈的「反機器人暴動」而動盪不安。然而，人類對機器人的集體仇恨，無關信仰或意識形態，而是源自「經濟生存」最殘酷的本能。

在《鋼穴》的體制下，人類勞工一旦被機器人取代，便遭「取消身分」；社會福利被剝奪、居所被收回，甚至連在公共餐廳用餐的資格也不復存在。艾西莫夫在七十多年前便已預見：當機器人的高效率與低成本不斷取代人類勞動，失業與剝奪終將累積成群眾的憤怒，而對機器人的仇恨，最終將反噬整個社會秩序。

比爾·蓋茲（Bill Gates）在二〇一七年接受《Quartz》採訪時，拋出在當時看似異想天開的「機器人稅」構想：如果一個人類工人透過工作創造價值，並繳納所得稅與社會保險保費，那麼當機器人取而代之時，也應該繳納等額的稅費。

時隔近十年，隨著大語言模型與人工智慧代理人加速進入勞動市場，昔日眾人茶餘飯後的機器人稅，已不再是天馬行空的想像，而是現代租稅制度無法迴避的難題。

今年四月，OpenAI 執行長山姆·奧特曼（Sam Altman）在官方白皮書中，進一步將機器人稅具體化為「自動化勞動稅」：主張對因導入人工智慧代理人而遭「完全取代」的職位課徵附加稅，藉以填補人類退出勞動市場後流失的薪資稅基。

蓋茲與奧特曼的構想，是稅制上的一大挑戰。自動化勞動稅面臨的第一個無解難題，是課稅主體與客體的模糊性；何謂「完全取代」？人工智慧的導入，並非搬走一張辦公椅，再換上一個冷冰冰的機器人，而是整體生產流程的重組與再造。例如，十人的客服團隊在導入人工智慧系統後，編制縮減為兩人；而這兩人不僅能處理原本十人的工作量，甚至還有餘力投入銷售與新產品研發。

試問，系統究竟「完全取代」了誰？被裁撤的是八個職位，但留下的兩人卻能創造更高產出；那麼，流失的究竟是哪一筆薪資稅基？更棘手的是，即使勉強認定被取代的人數與薪資，政府又該如何設計稅率與費率，精準補回原有的稅收與保費？

換言之，自動化勞動稅的問題，不是稅率訂多少，而是根本無法界定「誰被取代、取代多少，以及該課多少」。制度設計已寸步難行，更深層的矛盾還在後頭。

歐洲議會早在二〇一七年便曾研議對機器人課稅，以減緩自動化速度；然而，因憂心扼殺會員國技術創新與產業競爭力，最終遭高票否決。

韓國則在二〇一八年率先出手，將大企業「自動化設備投資」的稅收抵減比例由百分之七調降至三；此舉被稱為「類機器人稅」：透過提高自動化成本，延緩勞工被取代的速度。然而，最新研究發現，此舉明顯抑制企業的自動化投資。與未調整相關稅制的日本相比，韓國相關產業的機器人安裝量，在政策實施後相對減少約百分之廿八。

就此，機器人或自動化勞動稅的本質，是以保護勞工、維持財政與社會穩定之名，行「對技術與生產力課稅」之實，無異於經濟自殘。以台灣為例，至今仍積極透過《產創條例》等種種租稅優惠，不斷鼓勵企業進行智慧機械與自動化投資，等同課徵「負機器人稅」，怎可能一手補貼自動化、一手課徵自動化勞動稅，在制度上自我否定？

因此，在各國競逐人工智慧投資、爭相延攬科技巨頭的賽局中，缺乏全球協作規範的機器人或自動化勞動稅，並沒有存在的空間。原因無他：當所有國家都在爭奪未來，沒有人會選擇在此刻向未來課稅。